



GCS

Global Civilization Studies

GCS, Vol. 1, No. 1, 2026, pp.27-40.

Print ISSN: 3106-0978; Online ISSN: 3106-098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c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gcs260103rcpat>



海外华侨的文化身份认同路径探索：以岭南大学华侨校友为中心

苏日娜 (Surina)，刘静 (Liu Jing)

摘要：本文以 20 世纪初期北美华侨第三代子女回归岭南大学接受中文教育为切入点，探讨华侨教育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以及华侨群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身份认同的建构路径。通过对李氏、刘氏、司徒氏等华侨家族个案的深入分析，本文揭示了岭南大学作为“文化桥梁”的历史意义，阐述了华侨群体如何在“离散”与“回归”之间寻求文化身份的平衡与重构。本文在孔飞力、王赓武等学者的华侨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下，重新审视华侨教育的文化意义，同时发现，岭南大学华侨教育不仅为华侨子女提供了文化认同的锚点，更成为连接海外华侨与中华文化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华侨群体；文化身份认同；岭南大学；华侨教育；离散理论

作者简介：苏日娜，中山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山大学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特藏文献研究、数字人文。电子邮箱：surina@mail.sysu.edu.cn。刘静（通讯作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研究方向：华侨华人史、海外中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电子邮箱：jing.liu@ubc.ca。

Title: Exploration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Path of Overseas Chinese: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Overseas Chinese Alumni of Ling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turn of third-generation overseas Chinese from North

Received: 30 Apr 2026 / Revised: 11 May 2026 / Accepted: 20 May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e 2026.

America to Lingnan University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xploring the uniqu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case studies of the Li, Liu, and Seto famil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ingnan University as a “cultural bridge”, and elaborates on how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sought bal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between “diaspora” and “return”. The study finds that Lingnan University’s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not only provided an anchor for cultural identity for the children of overseas Chinese but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link connecting overseas Chinese with Chinese cultur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the overseas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of Philip A. Kuhn and Wang Gungwu, and to re-examine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Lingnan University;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iaspora Theory

Author Biographies: **Surina**, Associate Research Librarian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Special collections organization and research, and Digital humanities. E-mail: surina@mail.sysu.edu.cn. **Liu J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ibrary, Canada. Research area: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diaspora, 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research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jing.liu@ubc.ca.

一、引言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大量华南地区民众因经济困顿、政治动荡而远赴海外谋生，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华侨移民潮。这些移民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却始终与故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了独特的“侨居”文化现象。正如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指出，中国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具有跨时代的韧性，移民并非为了永久离开，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归（Kuhn, 2008, p.3-5）。这种叶落归根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华侨群体的文化心理之中，塑造了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模式。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教育成为华侨群体维系文化认同、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由“美国美北长老会海外差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的岭南大学，作为中国最早向中国政府注册并实行华人管理的教会大学之一，在华侨教育史上占据了特殊地位。20世纪初期，众多北美华侨子女不远万里，横渡太平洋，回到祖国进入岭南大学求学。这一现象引发了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这些在北美出生和成长的华侨第三代，为何选

择回归故土接受中文教育？岭南大学在他们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华侨群体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处理自我身份认同？

二、研究回顾

海外华侨史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在这一领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飞力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孔飞力认为，华人移民是通过一条条通往海外的“通道”完成移民的，通道两端是小小的社会环境，移民在远方分布着的小圈子中维持生计（Kuhn, 2008, p.12-15）。这种模式的本质是联系而非分离，即散居四方并不意味着家的解体，移民他乡者仍然负有对家庭的道义责任。孔飞力特别指出，“侨居”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它强化了移民所在地同胞之间的团结，为生意和社会交往提供便利，同时维系了与故乡的情感通道（Kuhn, 2008, p.12-15）。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华侨教育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而岭南大学正是连接北美华侨与祖籍地的重要“通道”节点。王赓武则从东南亚华侨研究出发，提出了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多元模式。他将中国移民历史分析为四种形态：华商、华工、华侨和华裔，并指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具有多重维度，既有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也有对所在国的政治认同，强调海外华人研究应当采用中国与东南亚的双重视野，关注“自我与社会”“参与者与观察者”的双重定位（Wang, 2000, p.45-67）。这一方法论启示我们在研究华侨教育时，必须同时考虑华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需求以及他们在北美社会的生存策略。在国内学术界，华侨教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上海社会科学院吴前进研究员对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英国卡迪夫大学班国瑞（Gregor Benton）教授对英国华人社团历史演变的研究等相关专题文献，都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¹然而，专门聚焦岭南大学华侨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少，从文化身份认同角度深入分析华侨校友的个案研究也相对缺乏。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与历史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司徒家族、李氏家族、刘氏家族三个相互联姻的北美华侨家族为核心研究对象，深入挖掘他们在民国时期送子女到岭南大学求学的历史轨迹。以岭南大学为切入点，以华侨家族为分析单位，以文化身份认同为核心议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理论视域下，探讨华侨教育如何成为连接“离散”与“回归”的文化桥梁。试图从宏观视角分析岭南大学华侨教育的历史背景与制度特征，深入剖析李氏、刘氏、司徒氏三个华侨家族的个案，展现他们选择岭南大学的多重动因，进而探讨华侨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机制。

三、岭南大学：华侨教育的文化桥梁

（一）岭南大学的华侨教育传统

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成立于1888年，由“美国美北长老会海外差会”创办。作为中国最早实行中西合璧教育模式的教会大学之一，岭南大学自建校之初就与华侨群体建立

¹ 参见吴前进：《孙中山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班国瑞、邓丽兰：《英国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华人社会的转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了密切联系。根据岭南大学奠基人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的评价，亚洲的西式学校其宗旨不是移植西方机制，而是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核，并使它们适合应用于亚洲(Hocking, 1997, p. xiv)。这一教育理念与华侨群体“学贯中西”的教育诉求高度契合。1908年，钟荣光先生出任岭南大学华人教务长，开始系统性地向海外华侨募捐筹款。民国初期，华侨和侨生为岭南大学带来了显著特色。据档案记载，1914年美国华侨司徒廷芳等人就为岭南大学农学院的设立在美洲华侨中广泛募捐(李瑞明，2005，p. 51)。1927年，钟荣光从美国学者手中正式接任校长职务，标志着岭南大学进入华人主导办学的新阶段。到20世纪30年代初，岭南大学已发展成为占地560英亩、拥有65座建筑的现代化大学，其中华侨捐款发挥了关键作用(Provost，1931，p. 9)。1918年，岭南大学特设华侨班，专门接收华侨子弟回国求学，此举开创了我国高校华侨教育的先河。学校规定“凡生长及家侨海外者，自十二岁至十八岁之学生，无论程度深浅，尽可收录”(郑翰君、张惠萍 2012, 89-90)。华侨学校的低门槛受到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侨生人数逐年增加。据档案资料记载，1932年侨生人数已达140多人，1936年岭南大学附中的侨生有70余人(私立岭南大学校报, 1936, p.20)。这一数据充分说明岭南大学在华侨群体中的重要地位。

（二）岭南大学的办学特色与华侨需求

岭南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华侨教育的重镇，与其独特的办学特色密切相关。首先，岭南大学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注册、由中国人接手管理的教会大学，华人教职员工和校董们的贡献突出。与美国学者精诚合作的同时，华人精英领袖不仅占教授中的三分之二，而且在校董会中也占多数，并承担筹募经费的责任。（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24）这种华人主导的办学模式使岭南大学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满足华侨群体的教育需求。其次，岭南大学实行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按照钟荣光校长的办学宗旨，即培养“世界各国通行之教育”的全球通识人才，岭南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进入西方的顶级名校深造，同时也欢迎西方人和海外华裔到岭南吸取中华文明养分。(张惠萍，2011，p.4)。这种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为华侨子女提供了在中西文化之间自由穿行的可能性。再次，岭南大学建立了完善的华侨支持体系。岭南大学是20世纪初中国最早建立中美双向交流机制的高校之一，并在1930年代率先开展较为制度化的美国交换生项目，为跨太平洋教育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美国交换生可以享受免学费和住宿费，但要承担食物和交通费用。

（三）华侨教育的文化意义

岭南大学华侨教育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为海外华侨子女提供了文化认同的锚点。王赓武教授指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具有多重维度，既有对所在国的政治认同，也有对中国的文化认同(Wang, 1997, p.131-151)。对于在北美出生和成长的华侨第三代而言，他们面临着双重文化压力：一方面要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要维系中华传统文化。岭南大学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他们在这里既能接受高质量的现代教育，又能深入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孔飞力教授的华人理论为我们理解岭南大学的文化意义提供了重要视角。他认为，华人移民网络的本质特征是联系而非分离，移民虽然身在海外，却始终与故乡保持着紧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Kuhn, 2008, p. 320-325)。岭南大学正是连接北美华侨与祖籍地的重要“通道”节点。通过将子女送回岭南大学求学，华侨家庭不仅

实现了文化传承，更强化了与故土的情感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岭南大学华侨教育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华侨子女通过岭南大学的学习，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他们的海外经历和跨文化背景也为岭南大学带来了国际化的视野。这种双向互动使岭南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桥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

四、三个华侨家族的文化选择

本部分将深入分析李氏、刘氏、司徒氏三个相互联姻的北美华侨家族，探讨他们为何选择将子女送回岭南大学求学，以及这一选择如何反映了他们在家族传承、文化认同和社会适应方面的深层考量。这三个家族的个案生动展现了孔飞力所说的“通道-小生境”模式的运作机制，也印证了王赓武关于海外华人多元身份认同的理论洞察。

（一）李氏家族：中西兼读的教育先锋

1914年10月，出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李毓堃和李毓霖昆仲回国留学，成为家族留学岭南的先锋队。这一选择的背后，是深刻的家学渊源和精心的教育规划。李氏家族的父亲李梦九（1862-1924）是北美大陆上知名的华侨领袖。1889年，他正式成为加拿大海关及移民局通译，肩负华洋沟通之重任。凭借对航运业的深刻洞察，李梦九积极争取成为维多利亚港口的首任亚洲代理，这不仅使他触及环球贸易和移民网络，也拓宽了他的国际视野。通过与司徒春颜的联姻，李梦九进一步巩固了家族在全球商业中的地位，并为子女在东西方世界中的游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Lee, 2005)。李梦九对教育的重视源于他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深刻理解。在没有本国领事的年月，他热心侨社，曾任“中华会馆”九届值理，同时醉心教育事业，是“乐群义塾”（1899-1909）创办人之一，并连任正董。为了华童数量的增长和对校舍的需求，李梦九协助共建华人自己的学堂并任名誉校长十一年之久。扩大后的“华侨公立学校”是北美最早和质量最高的华文学校，毕业生可以直接与国内高校接轨。李梦九曾明确表示要“为太平洋两岸的沟通和贸易培养人才”，他与岭南大学前身“格致学堂”的钟荣光和崔通约多有来往，具有共同的教育救国理念，致力于培养兼容并蓄的国际人才（刘静，2024）。1914年，加拿大西部还在逐渐建立起正式的大学，岭南学堂已经蜚声海外。李梦九的两公子在告别加拿大的宴会上致辞道：“将奉父母之命去岭南学习”，在场的侨界领袖纷纷发言鼓励，盛赞他们“中西兼读，未来不可限量”（《大汉日报》，1914, p. 3）。这一场景充分体现了华侨社群对中西合璧教育的高度认同。李毓堃和李毓霖在岭南大学的学习经历为他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20年，李梦九到香港任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蒸汽涡轮船运经理，与北美西海岸的亲友们共同经营太平洋运输。他于1924年染疾去世后，其两子接替父亲的职务，掌控太平洋对岸香港的海运业务“昌兴公司”²。能利用中西不同语言文化和知识，经营中、加之间的贸易和运输，李氏的儿女践行了父亲当年的愿望，成为大洋两岸沟通和贸易的人才。

李氏家族的个案充分体现了孔飞力“通道-小生境”理论的精髓。李梦九通过创办华侨

² “昌兴”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在香港的公司名称，相关档案藏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香港的《南华早报》和温哥华的《大汉公报》对李家公子的海运工作有所报道。

学校、与岭南大学建立联系，为子女搭建了一条从北美到中国的教育通道。这条通道不仅服务于单个家庭，更惠及整个华侨社群。1915年维多利亚的华侨公立学校毕业生，华裔子弟步李氏昆仲的后尘，随同先生黄笏南，横渡太平洋投身岭南大学。这种基于地缘、业缘和血缘的社会网络，正是华人移民得以在异国他乡生存发展的重要机制。

（二）刘氏家族：跨国教育的代际传承

刘氏家族的故事展现了华侨家庭如何通过跨代努力实现文化认同的传承与重构。作为李氏的远亲，刘氏家族同样期望其后代能够融合中西文化。刘乾，刘氏家族的第一代移民，广东台山人，自学成才，成为美国西部矿山和铁路的承包商，育有六名子女，并与加拿大的司徒森和李梦九建立了联系。刘乾在去世前成功经营唐人街多家公司，涉足进出口及零售贸易，其业务在西雅图英文报纸上广为宣传。这种商业上的成功为后代的教育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民国初始，教育救国是全球有识之士的目标。刘乾的长子吉祺是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首位华人学生，又是晚清的“法政科举人”。刘吉祺的儿子、刘氏的长孙毓麟（Lawrence Kay Lew, 1914-1943）与司徒氏的长孙炳唐（Wilfred Bientang Seto, 1914-1960）同岁，但分别在太平洋的两岸出生。在李氏兄弟留学岭南大学期间，刘吉祺已在北洋政府的新式高校担任职务。他与美国西北角荣誉领事阮洽的女儿结为伉俪，婚后一同前往中国，投身于唐山交通大学的工作。刘吉祺从中国回到西雅图后，出任副领事，阮洽将出席公共场合演讲的任务都交给女婿。刘吉祺辅佐岳父管理家族的矿产生意，同时承担美国西北地区的侨务。他在20世纪30年代起担任民国驻西雅图的领事，在为侨胞们争取权益的同时，也希望子女能学贯中西。刘家的毓麟和毓真兄妹分别在1934和1935年作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在校学生交换至岭南留学。

刘氏家族的个案深刻反映了华侨家庭在文化认同传承方面的复杂考量。一方面，他们希望子女能够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如刘毓麟、刘毓真都先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子女完全西化，失去中华文化根基。岭南大学的交换生项目恰好为这种两难处境提供了解决方案，子女可以在完成美国学业的同时，到中国深入了解祖籍文化。这一选择背后，是华侨家庭对身份认同的深刻洞察。王赓武教授指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可以同时拥有多重认同的复杂结构（Wang, 2000, p. 123-145）。刘氏家族的选择正是这种多元认同策略的体现，他们既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又希望保留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岭南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性途径。

（三）司徒家族：家族网络的跨国运作

司徒家族的个案最能体现孔飞力“通道-小生境”模式的完整运作机制。这个家族不仅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更在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方面建树颇丰，成为北美华侨社群的典范。司徒森（字藩贞，1837-1927）是清代例贡生，作为奔赴西海岸谋生的第一代华人，初到加拿大时，面临着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及针对华工的歧视。他与华商共同建立了“中华会馆”，旨在保护华人社群并提供互助。该组织不仅促进了华人的团结，还从广东聘请专业教师，确保第二代华人在接受西方教育的同时，也能接受传统中文教育。司徒家族积极参与中华会馆和华侨学校的建设，并在公益事业上出钱出力，其贡献不仅限于华人社群

(*Daily Colonist*, 1900, p.8)。司徒氏的六个子女是在加拿大最早出生的华裔二代。长女司徒春颜于 1892 年嫁给了海关总通译李梦九，长子司徒旄在 1913 年迎娶美国西雅图华商刘乾之女刘玉柳。这两个联姻案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们不仅是两个个体的结合，更是三个华侨家族的联盟，构建了一个横跨美加两国的商业、教育和文化网络。1914 年 8 月 21 日，司徒氏的第三代炳唐出生。1933 年，司徒炳唐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面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他和妹妹司徒美先受到家族中已在岭南大学学习的堂兄表姐的影响，决定赴岭南大学留学。1936 年 8 月 22 日，在父母的鼓励下，兄妹俩启程前往中国，开启了留学生涯。(*Vancouver Sun*, 1936, p. 10)。

司徒旄传承了父亲司徒森、姐夫李梦九的海外侨教理念，且热衷于美、加的华侨教育事业。他有短暂的多伦多大学求学经历，被誉为华裔二代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不仅从海外中文学校为国内输入人才，也为国内学子留学西方创造条件。1906 年，他领导一群热血青年在维多利亚成立了“尚志学校”，专门服务于有意求学西方的国人。1912 年，他与姐夫李梦九一样成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远洋邮轮经理，负责温哥华和亚洲之间的客务，并于年底前往美国西雅图，为华侨学校落成代表加拿大的侨胞和教育界致辞(《世界日报》1909)。司徒家族的跨国网络运作在第三代的教育选择上表现得淋漓尽致。1937 年，家族第三代正值青春年华，本是成家立业之时，却因国家危机而投身民族救亡。在上海过暑假的司徒炳唐加入万国商团救助伤员维持难民营秩序。他本来已经于南京沦陷前返回加拿大，但在两年后重返岭南与民国女飞行中尉、外交官郑汉英成婚，并协助郑在北美为民国空军赢得支持。刘毓真则留在上海积极参与制作防毒面具，不愿离去。早在华盛顿大学的刘毓麟就是学校辩论队的领，他在岭南大学表现优秀，后被哈佛商学院录取，并于 1940 年秋毕业，本可以继承家业，却一心在美国宣传抗日并要加入空军到中国抗战(*The Seattle Star*, 1937, p.10)。他以美军第 14 航空队中尉教官身份，随军舰经北非航线赴中国昆明执行任务。同年 11 月 26 日，该舰在航行途中遭德军袭击沉没，刘毓麟不幸遇难，时年二十八岁)。司徒家族的个案深刻揭示了华侨家族如何通过跨国网络实现文化传承和社会适应。这一往来过程呈现明显特征：第一，基于地缘和血缘的紧密联系。司徒、李氏、刘氏三个家族均来自广东省，通过联姻形成了紧密的亲属网络。这一网络横跨美加两国，在商业、政治、教育等领域相互支持。第二，对教育和公益的共同追求。三个家族都高度重视子女教育，共同创办了华侨公立学校，为华侨社群提供教育服务。这种对教育的重视代代相传，成为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在中西文化之间的灵活穿行。家族成员既能在西方社会中获得成功，如司徒旄成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远洋邮轮经理，又能保持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将子女送回岭南大学求学。这种文化上的双重能力使他们成为中西交流的桥梁。第四，对祖籍地的持续关怀。虽然身在北美，司徒家族始终牵挂着故国的命运。从第一代接待康有为等改良派，到第二代支持辛亥革命，再到第三代投身抗日战争，家族的每一代人都以不同方式参与着中国的事务。这种家国情怀正是华侨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四) 三个家族个案的共性与差异

通过对李氏、刘氏、司徒氏三个家族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共性：首先，三个家族都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焦虑。他们虽然身在北美，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

但始终担心子女完全西化，失去中华文化根基。这种焦虑源于华侨群体在异国他乡的边缘化处境，他们既不被西方主流社会完全接纳，又担心被中华文化圈边缘化。其次，三个家族都将岭南大学视为解决文化认同焦虑的理想途径。岭南大学的中西合璧教育模式、华人主导的办学特色、对华侨学生的特别照顾，都使其成为华侨家庭的理想选择，他们认为子女们既能获得现代教育，又能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实现“学贯中西”的教育目标。再次，三个家族的选择都体现了“通道-小生境”模式的运作机制。他们通过家族网络、地缘关系、商业联系等多种渠道，构建了一条从北美到岭南的教育通道。这条通道不仅服务于单个家庭，更惠及整个华侨社群。然而，三个家族的个案也存在明显差异：李氏家族更强调商业实用主义，他们选择岭南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中西兼读”的贸易人才，以服务于家族的商业网络。刘氏家族更注重学术传承，他们通过交换生项目实现中美教育的结合，体现了对学术质量的高度关注。司徒家族则更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的选择不仅考虑家族利益，更关注华侨社群的整体发展和中国的民族命运。这些共性与差异共同构成了华侨教育选择的复杂图景，也为相关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

五、理论对话：离散、回归与文化身份认同

本研究希望在前述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在华侨史、微观史的研究基础上尝试探讨华侨教育在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中的理论意义，希望进一步推进对华侨文化认同机制的理解。

（一）“通道—小生境”模式与华侨教育

上文已陈述，孔飞力提出的“通道-小生境”模式是理解中国移民历史的重要理论框架。该模式认为，华人移民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通过一条条通往海外的“通道”完成的系统性迁移。通道的两端是小小的社会环境：一端是侨乡，另一端是移民聚居地；移民在远方分布着的小圈子中维持生计，这些圈子就是“小生境”(Kuhn, 2008, p. 12-18)。岭南大学正是连接北美华侨与祖籍地的重要“通道”节点，这一发现可进一步阐释和丰富孔飞力的理论。

第一，教育通道的多重功能。在孔飞力的论述中，“通道”主要涉及经济和社会层面，移民通过通道获得资金、信息和社会支持，在异国他乡建立生计。然而，岭南大学的案例表明，教育通道具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传递渠道，更是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通过岭南大学这一教育通道，华侨子女得以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强化与故土的情感联系，实现文化身份的确认与重构。第二，“小生境”的文化意义。孔飞力强调，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建立的“小生境”是为了应对歧视和边缘化而采取的适应性策略。本文的研究发现，“小生境”不仅是生存策略，更是文化选择。司徒、李氏、刘氏等华侨家族在北美建立的华侨学校、中华会馆等机构，不仅服务于经济生存，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他们主动选择将子女送回岭南大学求学，正是为了强化这一文化“小生境”的功能。第三，“通道”的动态演变。孔飞力指出，华人移民的这种模式具有跨时代的韧性，能够根据时代变化而自我调整(李明欢, 2016, p.9)。从1914年李氏昆仲率先留学岭南，到20世纪30年代司徒兄妹、刘氏兄妹陆续前往，再到战后新一代华侨的持续涌入，岭南大学的华侨教育通道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反映了华侨群体在不

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需求。第四，“回归”的多元内涵。孔飞力认为，中国移民的“侨居”观念，即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归故里塑造了移民的基本心态。然而，通过三个家族的相关梳理发现，“回归”具有多元内涵。对于岭南大学的华侨校友而言，“回归”不仅是地理上的返乡，更是文化上的寻根、身份上的确认。许多人虽然在岭南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北美，但他们带回了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这种“精神回归”比物理回归更具深远意义。

（二）多元认同与文化协商

王赓武教授（1959）关于海外华人多元认同的理论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他将中国移民历史分析为四种形态：华商、华工、华侨和华裔，并指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具有多重维度，既有对所在国的政治认同，也有对中国的文化认同。首先，认同的代际差异。王赓武的研究主要关注东南亚华人，其身份认同经历了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本文研究的北美华侨第三代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代际特征。他们既不同于第一代移民对中国文化的完全认同，也不同于第二代移民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摇摆，而是试图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岭南大学正是实现这一文化融合的理想场所。其次，认同的情境性。华侨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动态调整。在北美主流社会面前，他们可能更强调自己的美国或加拿大身份；在华人群体内部，他们又更突出自己的中华文化认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场合，他们则能够灵活地运用双重文化资本。这种情境性的认同策略使他们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游刃有余。再次，认同的协商性。本文的个案研究表明，华侨的身份认同是在家庭、社群、学校等多重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协商建构的。李氏家族强调商业实用主义，刘氏家族注重学术传承，司徒家族则更关注家国情怀，这些不同的家族取向塑造了后代不同的身份认同模式。岭南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在这一协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最后，认同的实践性。王赓武强调，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确认和强化。岭南大学的华侨校友通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社会实践和抗日救亡运动，不断确认和强化自己的中华文化认同。刘毓麟在岭南大学期间参与抗议日本侵略的集会，司徒炳唐在上海参加万国军团救护伤员，这些实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建构。

（三）离散理论与华侨教育

近年来，离散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兴起，为理解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离散理论强调移民群体与故土之间持续的文化、情感和想象性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塑造了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实践。本研究发现，岭南大学华侨教育正是离散理论的生动例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想象的共同体。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83）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华侨群体通过岭南大学这一文化符号，构建了一个跨越太平洋的“想象的共同体”。他们虽身在北美，却通过将子女送回岭南大学求学，保持着与祖籍地的文化联系，维系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种想象性的联系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文化记忆的传承。离散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保持对故土的文化记忆。岭南大学为华侨子女提供了直接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使他们得以亲身感受和体验祖籍文化，将家庭中的文化记忆转化为个人的文化体

验。这种文化记忆的传承是华侨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第三，双重意识的形成。美国非裔学者 W.E.B. Du Bois (1903) 提出了“双重意识” (double consciousness) 的概念，描述非裔美国人在两种文化身份之间的矛盾处境。本研究发现，岭南大学的华侨校友也形成了类似的双重意识，他们既认同西方文化，又保持中华文化认同；既能在西方社会中游刃有余，又能在中华文化圈中找到归属感。这种双重意识不是身份认同的障碍，而是跨文化能力的体现。第四，跨国网络的构建。离散理论强调移民群体构建的跨国社会网络。岭南大学正是这样一个跨国网络的重要节点。通过岭南大学的校友网络，华侨群体得以在北美和中国之间建立持久的社会联系，实现信息、资源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这一网络不仅服务于个体发展，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

(四) 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其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为理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案例。近年来，学术界对教会大学的研究日益深入，特别是对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用的探讨。美国学者鲁珍晞 (Jessie G. Lutz, 1971) 在其研究中指出，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它们既传播了西方文化，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岭南大学虽然由美国长老会创办，但在华人校长钟荣光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中西兼读”的教育特色。这种特色恰好满足了华侨群体的教育需求，他们既希望子女接受现代教育，又不愿放弃中华文化传统。本研究还发现，岭南大学的中西合璧教育模式对华侨身份认同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这种教育模式使华侨子女得以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强化了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又保持了与西方教育的接轨，使他们能够在完成岭南大学学业后继续在西方深造或就业。这种教育上的灵活性为华侨群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此外，岭南大学的华侨教育实践也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流动提供了历史参照。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跨国教育流动的研究日益增多。岭南大学的案例表明，这种教育流动并非新现象，早在 20 世纪初期，华侨群体就已经在北美和中国之间进行系统的教育流动。这一历史经验对于理解当代跨国教育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结语

本文以 20 世纪初期北美华侨第三代回归岭南大学接受中文教育为切入点，通过对李氏、刘氏、司徒氏三个华侨家族个案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华侨教育在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历史作用，并与孔飞力、王赓武等学者的研究进行了理论对话。研究发现，岭南大学作为华侨教育的重镇，不仅为华侨子女提供了文化认同的锚点，更成为连接海外华侨与中华文化的重要桥梁。第一，岭南大学华侨教育的兴起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期，大量华南民众移居北美，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华侨社群。这些华侨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却始终与故土保持着紧密联系，形成了独特的“侨居”文化现象。他们既希望子女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又担心完全西化失去中华文化根基。岭南大学的中西合璧教育模式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成为华侨群体解决文化认同焦虑的理想途径。第二，华侨家族选择岭南大学具有多重动因。本文研究的三个家族虽然各有侧重，李氏家族强调商业实用主义，刘氏家族注重学术传承，司徒家族则更关注家国情怀，但他们都认识到岭南大学在文化传

承和身份建构方面的重要价值。通过将子女送回岭南大学求学，他们不仅实现了家族的文化传承，更强化了与故土的情感纽带。第三，岭南大学华侨教育体现了“通道-小生境”模式的运作机制。通过家族网络、地缘关系、商业联系等多种渠道，华侨群体构建了一条从北美到岭南的教育通道。这条通道不仅服务于单个家庭，更惠及整个华侨社群。岭南大学作为“通道”的重要节点，为华侨群体提供了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第四，华侨身份认同具有多元、动态、情境性的特征。

本文的研究表明，华侨的身份认同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可以同时拥有多重认同的复杂结构。这种认同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动态调整，在家庭、社群、学校等多重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协商建构，岭南大学在这一协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第五，岭南大学华侨教育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为华侨子女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又保持了与西方教育的接轨，使他们能够在完成岭南大学学业后继续在西方深造或就业。这种教育上的灵活性为华侨群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当前，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着如何在保持中华文化特色的同时融入当地社会的挑战。岭南大学的经验表明，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开放包容的办学理念、对华侨需求的深刻理解，是海外华文教育成功的关键。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如何处理好本族文化认同与主流文化认同的关系，是许多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岭南大学的经验表明，双重文化认同不是障碍，而是跨文化能力的体现。通过教育引导，可以帮助个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找到自我定位。其次，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经验表明，教育交流是促进文化理解的重要途径，宗教、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可以在此找到交汇点。在此过程中可以发现岭南大学的华侨教育实践表明，吸引华侨子女回国求学是维系华侨与祖籍地联系的有效方式。通过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可以满足华侨群体的文化需求，增强他们对祖籍地的认同感。

司徒、李氏、刘氏也许是千万华侨家族中的一个缩影，折射了华侨家族尤其是华侨第三代人的多数状况。他们成长的轨迹和家族的发展，勾画出华侨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和教育路径。通过对这些华侨家族的历史考察，我们不仅能够观察到这些家族在海外社会中的奋斗与成就，还能深入了解到华侨群体在文化融合、身份认同以及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方面的独特经历。岭南大学作为华侨教育的先驱，为海外华侨子女提供了深入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的机会。通过教育，这些华侨子女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从而在异国他乡中建立起坚实的文化身份认同。岭南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氛围，深深影响了这些家族的后代，使他们在继承家族传统的同时，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华侨。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华侨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时融入多元社会，如何在跨国流动中维系文化认同，如何在双重文化背景下实现自我发展，这些百年前的历史课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岭南大学华侨教育的历史经验，为我们理解和应对这些当代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和智慧启迪。

基金项目：本文系韬奋基金会 2025 年度规划课题“粤港澳期刊出版与近现代韬奋精神的跨境传播实践”（编号：TF2025138）研究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Surina ^{ID} <https://orcid.org/0000-0002-1060-6511>

Liu J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2-1796-3148>

References: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班国瑞、邓丽兰(2005): “英国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华人社会的转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02)。

[Benton, Gregor & Deng, Lilan (2005).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British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02).]

“Lew Kay to Talk” (1937) .*The Seattle Star*, October 27, Page 10.

“Goon Dip’s Keen Wounded, Killed” (1944) .*The Seattle Star*, August 9, , p. 2.

Du Bois, W.E.B. (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A.C. McClurg & Co.

刘静 (2024) : 《振振公族: 近代北美司徒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Liu Jing (2024). *Zhenzhen Gongzu: The Legendary Story of the Situ Family in Modern North Americ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李毓堃兄弟回国回粤岭南求学之佳音”，《大汉日报》1914年10月22日，第3版。

[“Good News of Li Yukun and His Brothers Returning to China and Studying in Lingnan.” (1914, October 22). *The Chinese Daily News*, p. 3.]

Wang, Gungwu (1959).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Gungwu, Wang (1997). “*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 In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s*. Westview Press.

Gungwu, Wang (2000).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5-67, 123-145.

“Indian Famine Fund: Contributed by Chinese Women and Children”, *Victoria Daily Colonist*, Oct. 9, 1900, p.8

“演说代论:续舍路华侨公立学堂开校演说词”，《世界日报》1909年12月15日，第1版。
[“Speech as Editorial: Continuation of the Opening Address at the Shelu Overseas Chinese Public School.” (1909, December 15). *The Chinese World*, p. 1.]

Provost, Henry (1931). “Prospectus Traces Histor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Lingnan University.” *The China Press*, Oct. 26, Page 9.

Hocking, William Ernest (1997): 《岭南大学·前言》。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

[Hocking, William Ernest (1997). “Lingnan University: Preface”. Lingnan University Fund-raising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

Lee, Jack Wai Yen (2006). *The Legacy of Lee Mong Kow Prefecture: Immortality of Heritage and Roots-2*. Victoria, BC: Privately Printed.

Kuhn, Philip A.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NUS Press.

李明欢（2002）：《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

[Li, Minghuan (2002). *A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in Europe*. China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李瑞明（2005）：《南国凤凰：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商务印书馆。

[Li, Ruiming (2005). *South China Phoenix: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Commercial Press: 51.]

刘宏（2003）：“王赓武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方法论的初步观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01）。

[Liu, Hong (2003). “Professor Wang Gungwu and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Methodology.”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01).]

Lutz, Jessie G. (1971).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Indian Famine Fund” (1897), *Daily Colonist*, Feb. 23, Page 5.

“Off Study in Orient.” (1936), *Vancouver Sun*, 25, August, Page 10.

吴前进（2011）：“孙中山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03）。

[Wu, Qianjin (2011). “Sun Yat-sen and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03).]

徐一良（2018）：《学府遗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Xu, Yiliang (2018). *Institutional Treasures*.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82.]

张惠萍（2011）：“钟荣光的教育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

[Zhang, Huiping (2011 October 13). “Zhong Rongguang'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China Social Sciences Today: Humanities Lingnan*.]

郑翰君、张惠萍（2012）：“钟荣光与岭南大学的华侨募捐活动”，《兰台世界》（34）：89-90。

[Zheng, Hanjun & Zhang, Huiping (2012). “Zhong Rongguang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Fund-raising Activiti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Lantai World* (34): 89-90.]